
语言学

核心话题系列丛书

Key Topics in
Linguistics

● 认知语言学
Cognitive Linguistics

KEY TOPICS
Tk

外语学科核心话题
前沿研究文库

隐喻与转喻研究

*

Studies on Metaphor and Metonymy

张炜炜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十三五”国家重点

语言学

核心话题系列丛书

Key Topics in
Linguistics

- 认知语言学
Cognitive Linguistics



外语学科核心话题
前沿研究文库

隐喻与转喻研究



Studies on Metaphor and Metonymy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喻与转喻研究 / 张炜炜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11
(2021.3 重印)

(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 语言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 认知语言学)
ISBN 978-7-5213-2215-6

I. ①隐… II. ①张… III. ①认知语言学—研究 IV. ①H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237089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选题策划 常小玲 李会钦 段长城
项目负责 陈阳
责任编辑 解碧琰
责任校对 陈阳
装帧设计 杨林青工作室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23.5
版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版 202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213-2215-6
定价 86.9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物料号: 322150001



记载人类文明
沟通世界文化
www.fltrp.com

出版前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信息技术发展、语言产业繁荣与教育领域改革等对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和外语学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有力推动了我国外语学术出版事业的发展。为梳理学科发展脉络，展现前沿研究成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汇聚国内外外语学界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精心策划了“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下文简称“文库”）。

“文库”精选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翻译学、外国文学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五大方向共25个重要领域100余个核心话题，按一个话题一本书撰写。每本书深入探讨该话题在国内外的研究脉络、研究方法和前沿成果，精选经典研究及原创研究案例，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展望。“文库”在整体上具有学术性、体系性、前沿性与引领性，力求做到点面结合、经典与创新结合、国外与国内结合，既有全面的宏观视野，又有深入、细致的分析。

“文库”项目邀请国内外语学科各方向的众多专家学者担任总主编、子系列主编和作者，经三年协力组织与精心写作，自2018年底陆续推出。“文库”已获批“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作为一个开放性大型书系，将在未来数年内持续出版。我们计划对这套书目进行不定期修订，使之成为外语学科的经典著作。

我们希望“文库”能够为外语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教师及研究者提供有益参考，帮助读者清晰、全面地了解各核心话题的发展脉络，并有望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期待“文库”为我国外语学科研究的创新发展与成果传播作出更多积极贡献。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年11月

“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任：孙有中 王克非 王文斌 文秋芳 张 剑
委员：蔡金亭 陈 红 刁克利 董燕萍 高一虹 韩宝成
黄立波 蒋 严 马秋武 秦洪武 司富珍 谭惠娟
王东风 王立非 徐 浩 许家金 许 钧 杨金才
袁毓林 张 辉 张 威 朱 磊

“语言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编委会

总主编：王文斌

普通语言学系列主编：袁毓林

句法学系列主编：司富珍

语义学系列主编：蒋 严

音系学系列主编：马秋武

语音学系列主编：朱 磊

认知语言学系列主编：张 辉

对比语言学系列主编：王文斌

总序

人猿揖别，其主要标志固然是人学会了直立行走，手与足形成了明确的分工，从而使人最终走出猿的世界，成为一个新的物种，但在其逐渐学会制造和使用复杂的工具，并需要表达复杂的思想时，具有各种表征结构的语言从简单渐渐走向精细，这一发展过程无疑使人更具备了人的属性。然而，语言虽为人所创造和使用，但语言的规律和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至今困扰着语言学家，无法给出一个人人都能认同的答案。这就如同人人都有大脑，时时使用着大脑，对其理应最为熟悉，但是，大脑的组织结构、神经系统等各种复杂关系和功能至今依然成谜，科学家目前对其的认识只是其神秘的冰山一角。如记忆是一个过程，人在记忆时实际上就是重建保存于大脑中零零碎碎的信息，但究竟是何种因素促发大脑开始这个重建过程？这依然令人迷惑。据说人类的大脑仅占人体重量的2%，其内部的血管总长度居然达到16公里，由1,000亿个神经细胞构成，相当于银河系内的恒星数量，但这些神经细胞彼此之间到底是怎样联结并发挥各自的功能的？这也是一个难解之谜。所以说，人体自身的东西，人类自己目前也未必就能说得清楚，人类的语言其实也是如此。

语言之谜尽管至今尚未完全破解，但语言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不言自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文明的记录和传承等均离不开语言。尤其是处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

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当下，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日益频繁，彼此的依存性、互动性和关联性愈益明显，语言从中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在此若把眼光仅放到国家层面，语言的作用同样十分显明。在《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中，“国家语言实力”和“国民语言能力”等概念的提出，足以证明语言对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这至少可从四个方面得到说明：一是国家的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治理、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等，无不需语言铺路。二是一个国家能否充分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事业等是其语言能力强弱的表现，不仅是一种软实力，也是一种硬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优秀文化的承继、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其表达和传播的主要工具就是语言，事关民族身份的认同，也事关国家的安全。三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助推科技创新、推进教育现代化、贯彻国家政策、增强文明意识、提振精气神等，均需借助语言这一重要媒介。四是国民语言能力的高低直接关乎其融入社会、与他人沟通交流、参与社会建设、强化文明行为、履行职业责任、执行国家意志、提升个人素质、保障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等。总而言之，不论作为世界公民，还是国家公民，抑或个人本身，我们都须臾离不开语言。也正因为此，加强语言研究实属必要。

就学科建设而言，不论西方还是中国，语言研究均可谓源远流长。尤其是20世纪以来，语言因无处不在，无时不存，其重要性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关切，而专门探究语言的规律和本质的语言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独立地位也愈益显豁，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伦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关注，其应用也日益广泛。到了21世纪，语言学无疑已成为一门显学。

毋庸讳言，就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而言，我国的研究能力目前尚未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若暂且不论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前的中国传统语文学（即“小学”），西方概念上的语言学研究在中国已走过120年的历史。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语言学既得益于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受缚于西方语言学的研究范式；既成功观察并描写了许多汉语事实，也留下了汉语的一些特殊语言现象因难以纳入西方语言学的分析框架而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这是中国语言研究者，不论是以汉语为主要研究对象还是以某一门外语或某几门外语为研究对象的学者，都需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需合力而为的目标。其实，作为语言研究者，我们不能止步于某一种单一语言的探索，而是需要以人类所有语言为考察对象。尽管我们目前难以将世界上6,000余种语言全部纳入研究范围，但至少尽可能开展两种语言、三种语言甚至更多语言的探究。赵元任先生早就说过，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研究的科学结论（转引自杨自俭、李瑞华 1990：1）。王力（2008：16）曾提到：“赵元任先生跟我说：‘什么是普通语言学？普通语言学就是拿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加以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我们如果不懂外语，那么普通语言学也是不好懂的；单研究汉语，也要懂外语。”吕叔湘（1977）曾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一文，提出“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吕叔湘先生的这些话都强调语言研究不能独尊一门语言，也不能独守某一语言的共时现象或某一通用语言，还要兼及方言等。简而言之，赵元任、王力和吕叔湘三位先生所强调的，就是语言研究需要具有历时的眼光和多语的眼光。我个人认为，外语研究者兼研汉语，可以以对比的眼光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所研究的外语；汉语研究者兼研外语，也可以以对比的眼光更深刻地反观自己对汉语母语的研究。这恐怕也应是赵元任、王力和吕叔湘三位先生所强调的主要思想之一。最近，张伯江（2018）强调：“在世界语言中认识汉语。”我们在此不妨做一个延伸：应在世界语言中认识我们所研究的外语。

语言研究，一般涉及三个层面：一是观察的充分性（observational adequacy）；二是描写的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三是解释的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遗憾的是，我们当下的研究中有些往往是观

察和描写有余而解释不足。即便有些研究声言其目的是为了解释某种语言现象，但常常仅停滞于表象，语言的规律和本质却远未得到深度揭示，其解释力远未充分。

本丛书就是鉴于我国的语言学研究现状及其不足，力图做到兼收并蓄，既借鉴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又顾重我国的汉语研究传统以及汉语实际；既有外语界的学者撰写，又有汉语界的学者著述；既有资深专家的参与，也有青年学者的投入；既注重语言的共时，又顾及语言的历时；既用力于单语研究，又用心于多语的对比探索；既力图掘深语言学研究的深度，又竭力拓宽语言学研究的广度；既着力于语言学研究的宏观扫视，又致力于语言学研究的微观透视；既注意本丛书的系统性，又关注各专著的相对独立性。

丛书包含普通语言学、句法学、语义学、音系学、语音学、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等7大子系列，每个子系列选择本领域最核心的话题，对该话题研究的发展力图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每本书都包含对国内外理论演进脉络的梳理，对前人和时贤研究贡献的述评分析，对经典理论的阐发，对实证案例的分析，对前沿的探寻和对学术空白的填补，并对研究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丛书兼顾学术辐射力和学术引领力，希望为外语学科高年级本科生、硕博研究生和年轻学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又冀望也能有益于非外语学科的研究者。这是我们每位作者的真切希冀，也应该是读者的殷切期待。

其实，本丛书宗旨的宗旨，就是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尽力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贡献具有中国智慧的语言学思想，筑就符合中国实际的语言学。这也应是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王文斌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2018年11月

参考文献:

- 吕叔湘, 1977, 通过对比研究语法,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二集(未公开发行)。
- 王力, 2008, 我的治学经验。载奚博先(编), 《著名语言学家谈治学经验》。北京: 商务印书馆。9-22。
- 杨自俭、李瑞华, 1990, 《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张伯江, 2018,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语言学研究, http://ex.cssn.cn/wx/wx_yczs/201808/t20180807_4524870.shtml (2018年11月3日读取)。

前言ⁱ

有关隐喻、转喻的论题一直备受符号学、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等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并形成了不同的隐喻观、转喻观或相关理论。比如，修辞学派的修辞隐喻观(陈望道 1979; 亚里士多德 1991, 1996)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法隐喻观(Halliday 1994; 胡壮麟 1996)，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Lakoff & Johnson 1980)，语用学视角下的隐喻类包含理论(Class-Inclusion Theory)(Glucksberg & Keysar 1990; Glucksberg 2001b)，等等。本书主要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介绍隐喻、转喻研究的核心内容和前沿进展，侧重于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

不同于传统的修辞学研究，认知语言学将隐喻和转喻视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概念系统，并认为隐喻、转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思维的本质方式。这一跨时代观点的提出在学界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为

i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概率模型的转喻识别英汉对比研究(17CYY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对此资助，笔者深表谢忱。

1 传统修辞学中，隐喻和转喻都属修辞格(figure of speech)“比喻”的子类，是文学性文本或诗歌的专利。而20世纪西方修辞学的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则认为，隐喻不完全是一种修辞现象，而是提供了一种认知事物的新视角(Burke 1973: 152)。尽管Burke也将隐喻视为一种劝说技巧，并强调隐喻的劝说功能，但Burke(1969, 1973)的观点与传统修辞学将隐喻视为装饰性修辞用法的观点有所不同，而更多地与当代概念隐喻理论契合。

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成为认知语言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概念隐喻、概念转喻”这一核心理论，认知语言学内部就其理论本身及其适用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迄今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随着相关理论的发展，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研究不再局限于认知语言学领域内部，而表现出明显的跨学科趋势。比如，受到社会语言学变异学派的影响，更多学者开始关注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的变异性；在语料库语言学技术的推动下，隐喻、转喻的标注和相关语料库建设正蓬勃发展；对于非语言层面的多模态隐喻、转喻的探索可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宝库（如，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中汲取营养；而要揭示隐喻、转喻的加工、理解规律，还需借助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技术。在此，须强调一点，尽管本书采取“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相关章节内容也主要围绕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开展，然而在当今学界，就隐喻、转喻研究（即便是“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研究）而言，其“认知语言学”的标签性也正在减弱。此外，相关理论的应用成果也已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如多模态隐喻、转喻研究成果在广告界、电影界的应用，隐喻、转喻数据库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应用，等等。这些现象充分说明，在当今背景下¹，如要从事隐喻、转喻研究，我们必须摒弃狭隘的学科观念，不可将眼光局限在本学科领域或某一理论“自娱自乐”，而应以更加开放的科学精神和合作模式整合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技术，以揭示隐喻

1 笔者先后参加了隐喻研究与应用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协会网址为<https://www.raam.org.uk/>）主办的第8届（荷兰阿姆斯特丹，2010年，主题为“隐喻与语篇”）、第9届（英国兰卡斯特，2012年，主题为“思维与社会中的隐喻”）、第10届（意大利卡利亚里，2014年，主题为“交际、科学和教育中的隐喻”）、第12届（中国香港，2018年，主题为“跨语篇和跨领域的隐喻：从描写到应用”）大会以及“跨时间和跨体裁的隐喻”工作坊（西班牙阿尔马格罗，2011年）。就笔者的一种参会直感而言，此类会议的参会人员呈现出明显的多学科背景。这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已经不仅仅是不同语言学学派的隐喻、转喻学者（如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的盛会，更是吸引了大量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参与，比如广告学、电影学、翻译学、文学、逻辑学、符号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等。此外，通过分析另外一些相关学术会议的主题和参会人员分布情况，如隐喻年会（Metaphor Festival）、修辞思维与语言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gurative Thought and Language）等，我们也不难看出隐喻、转喻研究的兼容性和开放性。

(转喻)、语言、交际、思维、认知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本面向初涉本领域的研究者的著作，本书不要求读者受过任何认知语言学训练，但如果掌握一些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念，那将非常有益。鉴于笔者的水平和兴趣，本书无法完全覆盖隐喻、转喻研究的方方面面，只能尽可能地将相关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最新动态呈现给读者。

全书共分为11章。第一章为导论，是全书的统领纲要。它首先阐述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科学内容的发展，涉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扩展以及方法论的完善；其次，介绍隐喻、转喻研究的社会学发展，具体体现于学会的成立，会刊的创立，以及研究成果的多样性；最后，概括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对学界的影响，其在应用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当下所面临的挑战。

第二章将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分别介绍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的本质和类型，这也正是“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Metonymy Theory)的核心内容。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人类基本的认知机制，其实质就是通过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具体而言，隐喻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跨域映射。在认知语言学看来，隐喻具有普遍性、概念性、系统性和体验性等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隐喻摆脱了被处理为纯语言现象的局限。限于篇幅，本章仅介绍了Lakoff & Johnson(1980)提及的三类概念隐喻类型，即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实体隐喻。不同于概念隐喻，学界对“概念转喻”的界定尚存争议，主要有基于认知域的定义和基于原型范畴观的定义两类处理方案。无论哪种方案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转喻和隐喻的区别、联系，以及转喻与其他常见认知机制(如切面现象、活跃区现象、提喻)之间的边界问题。此外，对于转喻的分类，学界也仍未达成共识。这些内容也将在第二章详细讨论。

在介绍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的基本概念、特征和类型之后，第三章以大量实例论证了隐喻、转喻在语义扩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隐喻、转喻是范畴扩展、词义延伸的基本手段。身体部位词汇以及感知动词

的共时多义性和历时语义演变都离不开隐喻、转喻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在词汇语义扩展过程中，隐喻和转喻并非孤立地起着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是两者之间的互动促成了语义的扩展。针对隐喻、转喻的互动关系，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分析模型，如Goossens(1995, 2003)的“隐转喻”概念，Ruiz de Mendoza Ibáñez等人(Ruiz de Mendoza Ibáñez 2002; Ruiz de Mendoza Ibáñez & Diez Velasco 2002)的四类隐喻、转喻互动关系，以及Geeraerts(2002)的棱镜模型。除了隐喻、转喻的互动关系以外，转喻链(或称为“连续转喻”“双重转喻”)也是语义扩展的一种重要形式。简言之，第三章主要是从“一形多义”(semasiological)的视角来讨论隐喻、转喻在语义层面的重要性，即某一语言形式如何通过隐喻、转喻机制发展出不同的意义。这是从语言形式出发看语义变化(variation in meaning)，从此视角看问题，有助于我们理清共时多义现象、历时语义演变的理据。

然而，要全面揭示隐喻、转喻的作用和功能，还需从“一义多形”(onomasiological)的视角出发，探讨对于特定意义或概念而言，如何选择隐喻或转喻的源域，源域的选择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等问题。比如，Kövecses & Radden(1998)归纳了一系列制约转喻源域选择的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就具体个案研究而言，学界讨论较多的是关于情感范畴的隐喻源域问题：我们通常可利用哪些隐喻源域来表达某一类情感(如“愤怒”“害怕”“幸福”)？除情感隐喻之外，人类范畴所涉及的隐喻、转喻源域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对于某一人类范畴(如，“女性”“男性”“美女”)而言，我们可以选择哪些隐喻、转喻源域来表达？此类研究是从语义(或概念)出发，看称名变化(variation in naming)，这正是本书第四章的主要内容。可见，第三章和第四章是从不同的视角方向来讨论语义问题，即从形式到语义(第三章)和从语义到形式(第四章)。

如果我们将眼光投向词汇的内部结构，从构词法层面来看，隐喻、转喻在词汇意义的构建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五章将围绕三类构词

法中的隐喻、转喻现象进行详细讨论。某种意义上，第五章是第三章内容——词汇作为整体，讨论其本义和隐喻义、转喻义之间的关系——在形态类型层面的延伸。对于派生构词而言，Janda(2011, 2014)认为，构词转喻与词汇转喻并无本质区别，二者形成一个连续统。然而，这一观点却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Brdar & Brdar-Szabó 2013, 2014b)，他们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会导致“转喻”这一概念过于宽泛，从而削弱了此概念的可操作性。复合词构词过程中的隐喻、转喻现象也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根据复合词意义构建中所涉及的隐喻、转喻机制，Benczes(2006)将英语创新“名+名”复合词分为三类：基于隐喻的创新复合词，基于转喻的创新复合词，以及基于隐喻、转喻互动的创新复合词。而对于转化构词法，学界尚未达成一致：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转化构词过程涉及转喻，比如，“名词-动词”转化可能涉及行动图式中语义角色到事件整体之间的转喻关系(受事*fish*转化为动词*to fish*以表达“钓鱼”的事件动作)(Dirven 1999)；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反对将转化构词现象处理为转喻(如Cetnarowska 2011)。除了这三类构词法之外，其他构词现象是否涉及隐喻、转喻也值得思考。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即意义”(language is all about meaning)(Geeraerts 2006a: 3)，这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其对意义的重视。在其看来，独立的词汇成分与功能性更强的语法成分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词汇和语法成分都是意义的载体，两者构成“词汇-语法连续统”(Langacker 1987: 18-19)。既然语言的词汇系统会受到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的影响，那么同样作为意义载体的语法系统也会受到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的影响。本书第六章的标题为“隐喻、转喻与语法”，将着重介绍在认知语言学范式下语法隐喻和语法转喻的含义和工作假设，以及隐喻、转喻与一些传统语法范畴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论元结构，情态范畴和代词回指现象。本章标题采用“语法”这一术语主要是出于章节安排的考虑，以对应隐喻、转喻在词汇层面的作用(参见第三、四章)，并非将

“语法”“词汇”分割为截然不同的系统。此外，在讨论隐喻、转喻和语法互动关系时，认知语言学者对形态和句法并未作严格区分；从广义上讲，“语法”本身也包括构词法(第五章)在内的各种结构的规则(参见 Panther *et al.* 2009; Brdar & Brdar-Szabó 2017)。可以认为，第五章与第六章都侧重于“词汇-语法连续统”上的“语法”部分。

要揭示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的规律自然离不开对真实语篇中隐喻、转喻表达的具体分析。早期的隐喻、转喻研究中，学者通常是依靠自己的直觉和内省来完成隐喻、转喻的识别和标注任务。这种操作方式难以保证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可靠性，从而削弱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为了提高隐喻、转喻研究方法的客观性和系统性，近年来，随着语料库技术的发展，学界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措施，用于有效识别语篇中的隐喻、转喻。Stefanowitsch(2006a)总结了多种在无语义标注的语料库中抽取隐喻、转喻的方法，如：人工抽取、搜索源域词汇、搜索目标域词汇、搜索包括源域和目标域词汇的句子、依赖“隐喻标记”进行抽取；对于已标注语义场或概念映射的语料库而言，其隐喻、转喻的抽取相对容易，但抽取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料库的标注质量。目前而言，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是Pragglejaz小组提出的“隐喻识别步骤”(MIP)(Pragglejaz Group 2007)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进版MIPVU(Steen *et al.* 2010)。尽管目前学界对转喻的识别和标注尚未提出统一的框架，但已有学者根据具体研究目的，针对一些特定转喻(如，地名转喻、专名转喻)制定了识别和标注步骤。这些步骤或标准将分别在第七章予以讨论。

自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提出之后，已有大量研究致力于探讨隐喻、转喻的普遍性、概念性、系统性、体验性，以揭示隐喻、转喻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认知机制。鉴于人类身体体验的相似性，我们不难推断出，不同语言和文化中可能存在类似的、通用的隐喻和转喻。隐喻、转喻的跨语言、跨文化可用性(availability)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然而，